第 60 卷 第 4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0, No.4
2023 年 7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ul. 2023

“北溪之怒”:嘉定年间的朱陆后学道统之争

汤 元 宋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嘉定十年,当久居漳州的朱熹门人陈淳抵达临安、严陵时,他对陆学进行了罕见而激烈的批评,甚至将陆学贬为“无一句是”“吾道之贼”。如此罕见而激烈的“愤怒”,由此成为理学史上朱陆之争中的标志性事件,甚至被认为是朱陆后学纷争不断的“导火索”。但回到嘉定年间理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会发现陈淳对于陆门的批评并不突然,而是与朱陆门人在嘉定年间的道统之争有关。嘉定年间朱陆门人的道统之争,既是对朱陆二人道统之争的接续与转换,也与嘉定年间理学所面临的发展形势密切相关。朱陆门人各自建构的道统叙述,最终刺激了陈淳对陆门予以激烈的批评。

关键词: 陈淳;黄榦;道统;朱陆之争

中图分类号:K 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4-0036-11

一、引言:嘉定十年的北溪之怒

陈淳(1159—1223),字安卿,学者称北溪先生,福建漳州人,为朱熹门下高弟。传统理学史对陈淳的学术立场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如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认为陈淳“卫师门甚力”①,四库馆臣评价陈淳“生平大旨,在于力申儒释之辨,以针砭金溪一派之失”②。“金溪一派”即指陆九渊及其门人,陈淳以为陆学是阳儒阴释,其论儒佛之异,所指实在陆门。理学史之所以对陈淳有此类评价,原因在于陈淳于嘉定十年(1217)对陆学展开了极为激烈、甚至略显突兀的批评。

陈淳久居漳州,长年以训蒙为业,同为朱熹弟子的陈宓曾形容陈淳“僻处南陬,与四方同门朋友声问不相接”③。迟至嘉定五年(1212),因偏好理学的赵汝谠主政漳州,陈淳的名声才稍显于临近的泉、莆之间。④ 大体而言,陈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陆学动态并不了解,嘉定十年前也罕对陆学有所批评。

然而,嘉定十年,当久居漳州、长年远离学术中心的陈淳抵达临安,并在临安周边的严陵(今杭州建德市)进行为期两月的讲学后,他发表了一系列针对陆门的激烈批评,并直指陆学“全用禅家意旨”“无

收稿日期:2022-08-31

作者简介:汤元宋,男,浙江温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南宋理学家群体生活世界研究”(项目编号:20BZX061)阶段性成果。

* 本文初稿部分曾参加北京大学第十次“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工作坊”、清华大学“朱子门人后学研究工作坊”和复旦大学“制度与文化工作坊”,得到与会师友的批评建议,修订过程中又蒙匿名审稿专家给予诸多建议,谨此致谢。

① 黄宗羲著,吴光点校:《宋元学案》卷六八,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 5 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81 页。

②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一,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386 页。

③ 陈淳著,张加才校点:《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儒藏》(精华编)第 240 册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93 页。

④ 陈淳著,张加才校点:《北溪先生大全文集》,第 599 页。

一与孔孟合”“无一句是”“与孔孟殊宗”“与周程立敌”“吾道之贼”。① 这些直斥陆学的内容,陈淳不仅私下写给同门,也直接写给严陵当地的陆门后学。相比于《严陵讲义》,这些毫不掩饰的文字更能反映严陵之行时陈淳的“愤怒”。

正因为陈淳在嘉定十年对陆学如此激烈而决绝的批评,蔡仁厚先生甚至认为“朱陆门户之争,多半是由北溪而决其澜的”②。但前辈学者也有不同看法,如陈荣捷先生就认为,陈淳在嘉定十年到访临安、严陵之前,并未关注过陆九渊,若说陈淳掀起朱陆两派之冲突,从历史演变上来说,是不正确的。③

诚然,如陈荣捷先生所言,陈淳久居漳州,并非居于学术中心的人物;但是,我们依然需要探究,陈淳何以会因短暂的临安、严陵之行,就对陆学产生如此负面的印象,并迸发出如此激烈的“北溪之怒”。

二、针锋相对:朱陆的道统之争

陈淳对陆门的批评,可视为朱陆后学之争中的突出表现;而朱陆后学的诸多纷争,都与朱熹、陆九渊二人的道统之争有关。过往研究朱陆之辨的学者,更多关注二人在义理方面的区别,如言朱主“性即理”、陆主“心即理”,朱重“道问学”、陆重“尊德性”,而较少留意朱陆的道统分歧。④

朱熹道统观的要义,可见作于淳熙十六年(1189)三月的《中庸章句序》。⑤ 正如土田健次郎所言,《中庸章句序》中有“两重道统论”。⑥ 历来学者所重视的,多为第一重道统,即朱熹提出二程兄弟接续了圣人千载不传之学;但朱熹的侧重点,可能更在于和他本人相关的第二重道统,序中后半部分云:

> 惜乎! 其(二程)所以为说者不传……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⑦

在第二重叙事中,朱熹认为二程门人各自为说,甚至有背弃师说而归于佛老异端者,而他的“使命”在于“拨乱反正”,接续二程道统。认为程门弟子“背弃师说”的表述,在朱熹笔下并非孤证,如绍熙四年(1193),朱熹在《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说“程氏既没,诵说满门,而传之不能无失,其不流而为老子、释氏者几希矣”⑧。对程门弟子“不流而为老子、释氏者几希”如此严厉批评的背后,是朱熹认为唯有自己方能接续二程道统的自信。

朱熹以道统自任的主张,也引起其他理学家,尤其是陆九渊的不满。淳熙十六年春朱熹写就《中庸章句序》“道统宣言”前后,陆九渊的文字中关于道统的内容明显增加,并且展现出与朱熹道统观“针锋

---

① 陈淳著,张加才校点:《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十二,第 141 页;卷二四,第 286—288 页;卷三二,第 374、379、381 页。

② 蔡仁厚:《宋明理学:南宋篇》,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2011 年版,第 294 页。

③ 陈荣捷:《陈淳〈北溪字义〉英译本:导言》,万先法译,《哲学与文化》1987 年第 5 期,第 324 页。

④ 彭永捷较为系统地讨论过朱陆的道统观,参彭永捷:《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55—269 页。本节将对包括书信在内的更多文献加以系年,以突显朱陆道统之争中“争锋相对”的特点。

⑤ “道统”概念虽非此序首创,但此序仍是最能体现朱熹道统观的文献,详见苏费翔:《朱熹之前“道统”一词的用法》,苏费翔、田浩:《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肖永明译,北京:中华书局 2018 年版,第 209—218 页。

⑥ 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朱刚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65—468 页。

⑦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5 页。

⑧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版)第 2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803 页。

相对”的特点。① 相比于朱熹的“两重道统论”，陆九渊的道统叙述也包括正反两方面：正面立论是他以道统自任、自陈直承孟子，反面批驳则是反对朱熹所推崇的从孔门后学到北宋周程的道统，甚至将矛头直指朱熹本人。

淳熙十六年秋，陆九渊在《与侄孙濬》信中说：“学者之不能知，至久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将谁使属之。”②谁能传千古圣人之心？陆九渊显然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自信。次年，他在《与路彦彬》信中就说“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③。

在另一封《与侄孙濬》信中，陆九渊认为北宋伊洛诸贤虽然超迈汉唐儒者，但依旧不如曾子、子思、孟子等先贤，也不足以承禹、周公、孔子三圣之道统，而如朱熹等“支离”之学，更是劳而少功、经年无所得。④ 陆九渊还曾和门人说：“直是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甚事？”⑤将北宋诸儒视为理学“草创”的同时，也将“大段光明”视为自己的道统使命。

在北宋诸儒中，陆九渊对程颐的批评最多。他曾对弟子说：“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⑥陆九渊的用意不仅在于批评程颐，也是在批评尊奉程颐的朱熹。

朱熹留意到了陆九渊的道统主张。淳熙十六年，朱熹和陆九渊进行太极无极之辩时，去信批评陆“更不数近世周程诸公”；朱熹坚持认为，“周程之生，时世虽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则有不约而合者”⑦。在这封信中，朱熹还借评价孔门弟子有若、子贡等，提出“颜、曾所以独得圣学之传，正为其博文约礼”，认定自己重读书、重讲学的“博文”工夫合乎圣人之学，暗讽陆九渊“空疏杜撰”的学风近乎于禅。

陆九渊自然明白朱熹批评的指向。他在和弟子的问答中也借孔门弟子批评朱熹：“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曾子所传，至孟子不复传矣。吾友却不理会根本，只理会文字。”⑧陆九渊暗示孔门之学有内、外之别，朱熹不过是“理会文字”，他才是“理会根本”。绍熙三年(1192)陆九渊在《与李省干》信中再次重申了类似观点，认为孔门弟子中无论是“才智最高”的宰我、子贡、有若，还是“擅文学之场”的子夏、子游、子张，虽然他们“言论足以动人，光华足以耀俗”，但都“不可以言道”。⑨ 在陆九渊看来，朱熹正是类似的学者——学问固有过人之处，但大本则有偏差。

朱陆相争之时，都曾向友人、弟子提及对对方的批评。淳熙十六年秋，陆九渊在《与曾宅之》信中说：“勤学之士反为之迷惑，自为支离之说以自萦缠”“此岂非以学术杀天下哉？”⑩自鹅湖之会陆九渊批评朱熹学问“支离事业竟浮沉”后⑪，“支离”二字在特定语境下所指乃是朱熹，此多为众人所知。当陆九渊批评朱熹“以学术杀天下”时，朱熹也对从陆门转投自己门下的万人杰说，陆九渊主张的“除意见”

---

① 关于陆九渊道统观的讨论，也可参考吉田公平：《中国近世の心学思想》，东京：研文出版 2012 年版，第 25—45 页。

②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90 页。

③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十，第 134 页。

④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一，第 13 页。

⑤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五，第 436 页。

⑥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四，第 413 页。

⑦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六，《朱子全书》(修订版)第 21 册，第 1576 页。

⑧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五，第 443 页。此条语录的分析另可参考小路口聪：《「即今自立」の哲学——陆九渊心学再考》，东京：研文出版 2006 年版，第 72 页。

⑨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一，第 14—15 页。

⑩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一，第 4 页。

⑪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六，第 490 页。

之说,“此三字误天下学者”。① 二人相争之时,因言辞所激,竟以为对方学问之流弊会至于“杀天下”“误天下”。

自淳熙七年(1180)张栻、淳熙八年(1181)吕祖谦相继去世后,理学士人多以朱熹、陆九渊为学林领袖,并多有辗转两家问学之人。当时门人中也不乏调和朱陆之人,早在淳熙九年(1182),来往于朱陆之间的项安世就曾投书陆九渊,认为“一二年来,(张、吕)数钜公相继沦落,任事者独先生与朱先生耳”②。而朱陆相辩时,陆九渊的门人也曾对陆九渊说“学者当兼(朱、陆)二先生之学”,陆九渊则明确拒绝了这种“调和论”,坚持认为朱熹是“见道不明”。③ 同样,朱熹也不接受调和,屡屡以“本是禅学”“只是禅”批评陆学,多次感叹陆学“可畏”“可悲”“可痛”。④

在道统层面,朱熹主张贬抑程门、承续二程,陆九渊则批评朱熹、直承孟子,这些观点都对各自门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最终在嘉定年间理学复兴的过程中,演变成朱陆门人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对于陈淳而言,他在朱熹人生的最后十年两度问学,先后得“根原”和“下学”之教;朱熹临终前数月,屡招陈淳在病榻前讲授义理,对他寄予厚望;朱熹病逝后,深受朱熹影响的陈淳也以谨守师门教诲为学问宗旨⑤,因此嘉定年间陆门的道统主张尤其令他难以接受。

三、争衡道统:朱陆后学的道统之争

朱陆道统之争,虽多“针锋相对”,甚至言辞苛刻,但朱陆毕竟是当时公认的、也是仅有的两位理学大家,彼此之间并未彻底否定对方,朱熹对于陆之德行,陆九渊对于朱之博学,都有充分的肯定。随着绍熙四年陆九渊过世,朱陆二人之间直接的道统之争告一段落,而朱陆门人中,本不乏辗转两家问学之人,加之随后便是理学共同体所共同面对的庆元党禁压力,因此在朱熹晚年、以及朱熹过世之初,朱陆门下并未呈现如嘉定十年“北溪之怒”时陈淳所展现的决裂之势。⑥

陆九渊临终前,曾让门人在其身后往朱熹处问学,甚至对门人说“惟(朱)先生之教是从”⑦;陆九渊过世后,陆门弟子包扬曾率陆门弟子十四人,“诣朱子精舍中,执弟子礼”⑧;庆元元年(1195),建昌一地

---

①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二四,第 2972 页。万人杰所记语录起自庚子(1180)后,但此条可据义理加以更精确系年。陆九渊在无极太极之辩时就曾去信朱熹批评他“事实湮于意见”,稍后又在《与曾宅之》信中提及此说;朱熹也在与癸丑(1193)之后前来问学的门人甘节、潘柄的讨论中提及对陆九渊“除意见”之说的批评,所以万人杰此条语类亦当在相近之时。详见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二,第 27 页;卷一,第 5 页;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二四,第 2972 页。

②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六,第 493 页。

③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四,第 419 页。此条语录后半句援引了无极太极之辩时陆九渊致朱熹信中的文字,可知此段对话当发生在无极太极之辩后。

④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二四,第 2970、2978—2979 页。此三条语录分别为叶贺孙、钱木之和邵浩所记,分别为辛亥(1191)以后、丁巳(1197)和丙午(1186)所记,也皆在无极太极之辩前后。

⑤ 陈淳与晚年朱熹问学之细节,可参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一七,第 2819—2834 页;陈淳著,张加才校点:《北溪先生大全文集》,第 595—597 页。

⑥ 陆九渊过世后朱熹对陆学的态度,以及庆元党禁期间和朱熹过世后朱陆门人之间的情势,此前研究多认为朱熹对陆学的批评并未减缓,详见: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第 227 页;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 396 页;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12—313 页。但这一观点或许需要更细致地辨析《朱子语类》卷一二四《陆氏》中的文本。陆九渊过世后,诸多陆门弟子转投朱熹门下,朱熹在与这些弟子问答时,难免会有对陆的评价,其中有肯定、也有批评。但晚宋朱陆门户之争激化后,黎靖德编纂《朱子语类》时,则仅将批评意见“汇编”为单独的一卷。如下文所示,陆九渊过世后至嘉定之前,朱陆门人之间仍有较为和缓的一面。

⑦ 孙应时:《烛湖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6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73 页。

⑧ 黄宗羲著,吴光点校:《宋元学案》卷七七,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 6 册,第 55 页。

23060000091005 04 汤元宋.fbd

的陆门弟子利元吉、邓约礼曾请朱熹作《建昌军进士题名记》①;庆元五年(1199),杨简给同门舒璘所作墓志铭中也说"(舒璘)于晦翁、东莱、南轩及我象山之学,一以贯之"②,并不突显朱陆学派之间的差异。而朱熹在陆九渊过世后也曾率弟子奔讣;曾与陆九渊同在湖北任官的朱门弟子詹体仁也作祭文称许陆九渊"儒者之学,入孝出弟,人言江西,陆氏兄弟"③;象山祠也是由在陆九渊家乡任职的朱门弟子刘启晦于庆元二年(1196)所建。④

然而,随着开禧北伐的失败,面对政治困局,宋宁宗开始以"崇道学"为"转移士习之机"⑤,使得嘉定年间形成对理学复兴更为有利的政治环境,即所谓的"嘉定更化"。⑥ 当理学在嘉定年间走出党禁阴影,其政治地位得到根本性转变,甚至有望通过配享从祀、赠谥录后、经筵进讲、修学立祠等活动获得官方认定的"道统"资质时,理学共同体内部的道统之争也由此复燃。

继朱熹率先于嘉定二年(1209)谥"文"后,乾淳年间的理学家以及北宋理学家也逐步获得带有道统意味的单字谥号:嘉定八年(1215)年张栻谥"宣",嘉定九年(1216)吕祖谦谥"成",嘉定九年和嘉定十年,周敦颐、张载、二程也陆续获得单字之谥。⑦ 而在这股请谥"浪潮"中,也有陆九渊门人的身影。从嘉定八年开始,陆门弟子就正式"集体"为陆九渊请谥,"诸生请谥、郡闻于朝",陆门弟子严滋在请谥之状中说陆九渊是"以身任道,为世儒宗",最终在嘉定十年陆九渊被追谥为"文安"。⑧

不同学派的请谥活动总会伴随着各自推尊己方的"道统叙事"。嘉定年间,朱陆门人各自请谥之时,他们也接续了朱陆原有的道统之争,致力于标榜各自师门的道统叙述,并将之扩大为朱陆门下诸弟子参与的学派之争。陆门弟子对陆九渊道统地位的推尊更是直接引起了陈淳的强烈反应,他在《与郑寺丞》信中明确指出陆门之推尊陆九渊是为了争衡道统:"乃嚣然欲以是争衡孔孟千载不传之绪,亦可谓无知之甚。"⑨

(一)朱门弟子:两重道统论的"变奏"

在朱陆门人建构的道统叙事中,朱熹门人继承了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的经典表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黄榦历时十余年、于嘉定十四年(1221)临终前方定稿的《朱子行状》。行状中云:

> 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由孔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盖千有余年间,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烬残阙、离析穿凿,而微言几绝矣,周、程、张子崛起于斯文湮塞之余,人心蠹坏之后,扶持植立,厥功伟然,未及百年踳驳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⑩

朱熹的"两重道统论"在黄榦笔下不仅被继承,而且被固化为一种"千年、百年"的道统叙述"模

---

①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第 3810—3811 页。

② 杨简著,董平校点:《慈湖先生遗书》卷二一,《杨简全集》第 9 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345 页。

③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六,第 513 页。此处《陆九渊集》作"张体仁",但即是"詹体仁",详见陈荣捷:《朱子门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96 页。

④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六,第 518 页。

⑤ 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卷二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43 页。

⑥ 党禁压力的松弛,可追述到嘉泰二年(1202),但全面放开则依旧当以嘉定更化前后为宜。关于庆元党禁最新的研究成果,详见李超:《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

⑦ 关于朱熹赐谥为"文"的过程及单字、二字之谥的分析,可参叶绍翁撰,冯惠民、沈锡麟点校:《四朝闻见录·丁集·文公谥议、覆谥》,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52—156 页;王宇:《师统与学统的调适:宋元两浙朱子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3—66 页。

⑧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六,第 520—521 页。

⑨ 陈淳著,张加才校点:《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第 286 页。

⑩ 黄榦著,周国林校点:《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四,《儒藏》(精华编)第 240 册下,第 564 页。

式”:孔孟之学湮灭“千年”乃有周程;而二程亡后“(未及)百年”乃有朱熹。这样的表述并不局限于《朱子行状》,如黄榦在嘉定十年所作《南康军新修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周衰道晦且千余载,周程夫子始得孔孟不传之绪;未及百年,大义乖矣,先生洞究其道而推其所未发。”①除了黄榦,朱熹的其他弟子,如陈文蔚在《祭朱文公》、度正在《晦庵先生画像赞》、陈宓在《淮安县学四先生祠记》中也都使用这一“千年、百年”的道统叙述。②

虽然这种“千年、百年”的道统叙述继承了朱熹的“两重道统论”,但与朱熹看似一致的表述背后,朱熹门人道统叙述中的“针对性”发生了转变。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对自己在道统谱系中的强调,是为了批评程门后学;而朱熹弟子对于朱熹的推尊,有时是为了对朱熹同时代的理学家进行“判教”。黄榦在行状中,点出了这种区别:

> 程张门人,祖述其学,所得有浅深,所见有疏密,先生既为之区别,以悉取其所长,至或识见小偏、流于异端者,亦必研穷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轩张公、东莱吕公同出其时,先生以其志同道合,乐与之友,至或识见少异、亦必讲磨辨难,以一其归。至若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说,学者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侧僻固陋,自以为悟……先生力排之。③

在黄榦笔下,程门后学、张栻、吕祖谦都可以算是朱熹的同道,即便流于异端,也不没其所短;但对“阳儒阴释”的陆学,黄榦措辞则颇为严厉,甚至直斥为“猖狂叫呶”。

四库馆臣曾因黄榦为与朱熹交恶、甚至迫害过朱熹的林栗撰写祭文,而认为黄榦“绝无门户之见”④,但至少在嘉定年间道统纷争之时,黄榦对陆学是有鲜明的立场。近似的案例还可见度正的文献。在绍熙四年陆九渊去世后,度正曾遇象山门人徐森来访,度正自言“余初闻其自象山来喜甚”,可见绍熙年间度正对陆门印象颇佳;但在嘉定七年(1214)度正为问学于张栻、朱熹的吴猎所作祭文中,便说“(二程之后)时仅逾于百年,眇先觉其未远兮,已异说之纷然,幸斯文之复兴兮,而晦翁、南轩、东莱三先生出焉”。⑤ 对于嘉定年间的朱子门人而言,他们所建构的南宋理学“拨乱反正”的道统谱系中,并无陆九渊的位置。

黄榦撰写《朱子行状》时,曾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当时曾有一种为陆学辩护的意见,以为“前辈不必深抑,异学不必力排”,为此黄榦在《朱子行状》篇末,以案语的形式再次申明自己明辨朱陆之异的立场,强调“然使圣贤之道不明,异端之说滋炽,是则愚之所惧而不容于不辨也”。⑥

朱门弟子追记朱熹的文字,除了黄榦的《朱子行状》,李方子所撰《紫阳年谱》也极为知名,二者体例稍异,但皆尊朱抑陆。《紫阳年谱》后世屡有增损,已难识其本来面目,不过李方子所作《紫阳年谱后论》尚可得见全文,其中如“洙泗以还,博文约礼,两极其至者,先生(朱熹)一人而已”之语,如不厌其烦地强调“字求其训”“句索其旨”“始以熟读”“继以精思”“反复以涵泳之”,以为非此“则终无入德之期”,显是尊朱立场。⑦ 明嘉靖年间,士人重陆王心学,明人李默便以为当时所存《紫阳年谱》中“尊朱诋陆为私

---

① 黄榦著,周国林校点:《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十八,第 258 页。

② 陈文蔚:《陈克斋集》卷四,《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68 页;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301 册卷六八七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4 页;第 305 册卷六九七五,第 201 页。

③ 黄榦著,周国林校点:《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四,第 561 页。

④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一,第 1386 页。

⑤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301 册卷六八六七,第 120 页;第 301 册卷六八七二,第 192 页。

⑥ 黄榦著,周国林校点:《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四,第 565—566 页。

⑦ 李方子:《紫阳年谱后论》,《朱子全书》(修订版)第 27 册,第 645—650 页。

23060000091005　　04 汤元宋.fbd

家言,非述作体”,亦可为一佐证。①

(二)陆门弟子:“独”得道统之传的“宣言”

当朱门弟子坚持以“两重道统论”突显朱熹的道统地位并贬抑陆学时,陆门则持另一种道统观,即陆九渊“独”得道统之传,认为孔孟之后一千五百年,得其传者“惟”象山。

开禧三年(1207)秋,陆九渊门人高商老刊印陆九渊文集,他在跋文中便有“此学久矣无传,独象山先生得之千载之下”之语。② 嘉定五年,陆门高弟袁燮刊印陆九渊文集,他所作序文中认为“象山先生其学者之北辰、泰岳欤”,孔孟之后道丧千载,“至先生始大发之”。③ 同年,陆门弟子编陆九渊遗文,陆门高弟傅子云所作序文中说:“先生生于孟子没千有七百余年之后,当浮伪杂揉,朱紫淆乱之时,乃能独信实理,而不夺于浮伪……回视曩之蔽于支离浮伪之说者,又不啻若夷犹于九轨之路,而灼见夫在荆棘泥淖者之为陷溺也。”④无论是认为陆九渊“独”得圣人之学、“独”信实理;还是不同于黄榦《朱子行状》中“(道统)至(朱)先生而‘始’著”的道统叙述,认为孔孟之后直至陆九渊方才“始”发明圣人之说;以及朱陆门人心知肚明的“支离”二字;又或者是忽略北宋诸儒、如傅子云般称陆九渊接续的是“千七百年”而非“千五百年”道统:嘉定年间陆门弟子的种种表述都代表着与朱门弟子不同的道统叙述,这种道统主张显然也会被朱熹门人所留意,且绝难为他们所接受。嘉定十年陈淳在《与黄寅仲》信中批评陆门后学喻仲可“其祭詹文道:‘孟子后千五百年,得其传者惟象山’”;在《与赵司直季仁》信中批评袁燮“若说去圣五百年,得其传者惟象山,但越见其魍魉无忌惮之甚”。⑤

陆门高弟之中,杨简最为尊陆,他对朱熹一系道统观的批评也最为尖锐。杨简屡屡批评程颐之说“殊为蔽窒”“穿凿撰造”“何言之浅”⑥,以至于陈淳到临安后都听闻“(杨)慈湖才见伊川语,便怒形于色”⑦。而相应的,陈淳对杨简也有严厉的批评。在严陵期间,陈淳得知严陵士人王震将往四明从学于杨简,便给王震去信称杨简“学术议论只是一老禅伯”,并作长诗深加规劝。⑧ 当时严陵的吕祖谦门人郑行之也欲转投杨简门下,陈淳去信郑行之,称“(吕东莱)子弟决不肯背其先学为异端之趋,不知子何从而得之欤”?⑨ 而当陈淳听闻朱门再传弟子郑节夫也将往四明从学杨简时,他“弥夜达旦,耿耿于中,不能以自平”,随即去信郑节夫,直斥杨简“不过只是一老禅伯祖师传授……本只是禅家宗派,非可以吾儒论”。⑩过往学者更多看到了陈淳在严州期间对陆门后学的批评⑪,但吕祖谦、朱熹门人转投陆门可能给陈淳以更深的刺激。

嘉定年间,袁燮“欲著书尊其师”的举措也让陈淳颇为警惕。陈淳在给同门赵师恕的信中讽刺袁燮“岂可强著书? 亦岂可强尊所学……假如推尊之极,亦不过《传灯录》上添一位尔”。⑫ 袁燮“欲著书”具体所指何书尚难明确,但《陆九渊年谱》确为陆门高弟袁燮和傅子云所著。

---

① 王懋竑撰,何忠礼点校:《朱熹年谱·朱子年谱原序》,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5 页。

②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六,第 518 页。

③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六,第 519—520 页。

④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六,第 519 页。

⑤ 陈淳著,张加才校点:《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第 364 页;卷二四,第 283—284 页。詹文道即詹阜民,为陆九渊弟子,喻仲可为詹阜民弟子。

⑥ 杨简著,董平校点:《慈湖先生遗书》卷十,《杨简全集》第 8 册,第 2100 页;卷十三,第 2161 页。

⑦ 陈淳著,张加才校点:《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三,第 276 页。

⑧ 陈淳著,张加才校点:《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第 372 页;卷一,第 13 页。

⑨ 陈淳著,张加才校点:《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二,第 374 页。

⑩ 陈淳著,张加才校点:《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二,第 378—379 页。

⑪ 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第 290 页。

⑫ 陈淳著,张加才校点:《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四,第 283—284 页。

如果说黄榦所作《朱子行状》堪称朱熹门下道统叙述的典范,那么由袁燮、傅子云所编撰的《陆九渊年谱》则可以视为陆门道统叙述的典范。若说黄榦所撰《朱子行状》是由朱熹门下弟子“反覆诘难”而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朱熹门人的共识①,则《陆九渊年谱》可以视为由陆门弟子甬上和槐堂两系合作的陆门道统“宣言”。② 而相比于学界对《朱子行状》的高度重视,《陆九渊年谱》的原貌与主旨则少有学者关注。

《陆九渊年谱》自谱主年少时的叙事,便已着意突显他与程朱道统谱系的差异。如陆九渊八岁条下,便记有“丱角时,闻人诵伊川语,(陆九渊)云:‘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孟之言不类?’”③十三岁条下,记有“复斋问曰:‘汝看程正叔此段如何?’先生曰:‘终是不直截明白’”。④ 陆九渊年少时的这些事件当时应在陆门广为流传,并非虚构,但在年谱中如此书写,则有服务于年谱突显陆门道统叙述主旨的意图。而十七岁条下所录《大人歌》,其中“万古不传音,吾当为君宣”一句,更是将陆九渊以道统自任精神表露无遗。⑤

《陆九渊年谱》还专设“论传道”条目以详述陆门的道统主张。此段中华书局本《陆九渊集》所附年谱删减过半,而原稿堪称陆门道统的总纲。⑥ 年谱编者通过截取陆九渊《与姪孙濬》信中的几段文字,汇编陆九渊门人所记语录中内容,从先秦道统、北宋诸儒尤其是程颐、以程颐道统继承人自居的朱熹几个层面,依次进行了详细评述,最终突显陆门道统的合法性。

年谱希望突显陆九渊的道统地位,则自然会着意处理他与道统“竞争者”朱熹之间的关系,对于同一件事实的叙述也采用更偏向陆九渊的“春秋笔法”。如陆谱淳熙十年条下,录有朱熹一通书信,信中朱熹自称“病中绝学损书,却觉得身心收管,似有少进处,向来泛滥,真是不济事”⑦。又如淳熙十五年条下云:“(陆九渊)闻朱元晦《喜晴》诗云:‘川源红绿一时新,暮雨朝晴更可人。书册埋头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先生闻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觉矣,是可喜也。’”⑧“绝学损书”“泛滥”“抛却书册”等,皆是理学共同体内部心知肚明的陆学对于朱熹的批评,而引用朱熹本人之语则传递出朱熹对自身学问宗旨的反思,以及对陆九渊学问的钦佩、甚至自愧不如的意思。

《陆九渊年谱》中所收录朱熹对于陆门弟子的评价也与朱熹后学所编纂的文献大不相同。晚宋如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其编纂方针是将朱熹对吕祖谦、陆九渊门人的负面评价“汇编”一处,以突显二人门下弟子之不堪。⑨ 而在《陆九渊年谱》中,编撰者或是收录朱熹文集中未收录的书信,或是删减朱熹文集中相关文献、仅保留正面评价,或者将朱熹在不同时期、语境下对陆门弟子的肯定汇编一处——总之是有意塑造朱熹对陆门弟子的正面评价。

如谱中录有朱熹文集中未见的致陆九渊的一通信,内容为“浙中士人,贤者皆归席下,比来所得为多,幸甚”!⑩ 年谱还删改朱熹《答林择之》,节录朱熹所言“其(陆九渊兄弟)门人有相访者,气象皆好”,

---

① 黄榦著,周国林校点:《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四,第 565 页。
② 《宋元学案》论陆门弟子,以为主要有浙江甬上一系和江西槐堂一系,而袁燮和傅子云,分别为两系代表人物。
③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六,第 481—482 页。
④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六,第 483 页。
⑤ 袁燮、傅子云:《象山陆先生年谱》卷上,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31 册,第 521—522 页。
⑥ 袁燮、傅子云:《象山陆先生年谱》卷上,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31 册,第 595—597 页。
⑦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六,第 494 页。
⑧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六,第 506 页。
⑨ 详见汤元宋:《语类编纂与“朱吕公案”:以〈朱子语类〉为中心的再考察》,《中国哲学史》2017 年第 1 期,第 80—87 页。
⑩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六,第 494 页。

却删去朱熹随后补充的“但其间亦有旧病”一句。① 年谱又将朱熹肯定陆门弟子的几处文字汇编于一处如下：

> 朱元晦语类云:“今浙东学者多子静门人,类能卓然自立,相见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辈朋友,又却觉不振。”又云:“子静之门,如杨简辈,躬行皆有可观。”又《与詹侍郎书》云:“高教授能留意学校甚善。渠从子静学,有意为己,必能开导其人也。”又《与刘仲复书》云:“陆丈回书,其言明当,且就此持守,自见功效,不须多疑多问,却转迷惑。”②

在嘉定年间理学复兴的大背景下,朱陆门人都在致力于建构自己学派的道统叙述,并且对彼此的差异也“心知肚明”,因此嘉定年间,朱陆门人相争,也时有“隔空论辩”之举。嘉定四年(1211)冬,隆兴府东湖书院建成时,袁燮曾为之作《东湖书院记》,记文中不乏尊陆抑朱之意,如说“君子之学,岂徒屑屑于记诵之末者”。③ 次年,当黄榦受同门杨楫之邀讲学于隆兴府东湖书院,则批评陆门弟子“若曰学可以不讲,而一蹴可以至乎圣贤之域”。④ 同期,黄榦赴任陆学重镇江西抚州附近的新淦县,他在县学讲授时大谈“学”之重要性,认为“未有不须学以成者”,批评陆学“以为圣人之道不假学问可以一蹴而入者,又未免于空虚无据之失”。⑤

四、余论:“先声”与“回声”

嘉定十年,当久居福建漳州、远离学术中心的陈淳抵达临安、严陵时,他所见到的是陆门弟子在为陆九渊请谥“造势”,也听到了陆门独尊陆九渊的道统主张。尤其是在严陵,陈淳亲见陆学之风行,他屡以“缠肌入骨”“缠肌蚀髓”“缠心肠、蚀肝肺”等语形容当地士人对于陆学的陷溺,甚至认为许多士人已“无可救药”。⑥ 凡此种种,都加剧了陈淳的危机感：

> 自都下时,颇闻浙间年来象山之学甚旺。以杨慈湖、袁祭酒为陆门上足,显立要津,鼓簧其说,而士夫颇为之风动。及来严陵山峡间,觉士风尤陋,全无向理义者。才有资质美志于理义,便落在象山圈槛中。⑦

嘉定年间,朱学盛于陆学,但论及朱陆门下如黄榦、陈淳、杨简、袁燮等高弟的政治地位,则陆门高于朱门。早在嘉定三年(1210),陈淳就曾去信朱熹之子朱在,询问当时同门之中“行当要津者,还有其人否”,而纵观嘉定年间,朱熹门人多挣扎、辗转于州县官职之中,并且动辄因“与时扞格”“与时相忤”而罢职⑧,有学者将此现象总结为官方对朱学是“尊其说而不用其人”。⑨ 而在陈淳看来,陆门高弟如杨简、袁燮则多占据要津,并且由此得以大肆宣扬陆学。陈淳的观察并非无据,如嘉定年间杨简轮对时,宋宁

---

①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六,第 492 页。此信另可见于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三,第 1983 页。

②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六,第 503 页。“仲复书”,当为“符仲复”,此信见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五,第 2619 页。

③ 袁燮著,王瑞明校点:《絜斋集》卷十,《儒藏》(精华编)第 238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0 页。袁燮此文也可能稍后于黄榦,但先后顺序不影响朱陆门人围绕东湖书院进行过“隔空论辩”这一判断。

④ 黄榦著,周国林校点:《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四,第 346 页。黄榦曾对门人说,此次东湖书院讲学正是针对“江西诸公有言学不必讲,可以一僦至圣贤之域”,参黄榦门人郑元肃、陈义和所编《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收录于黄榦著,周国林校点:《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第 749 页。

⑤ 黄榦著,周国林校点:《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四,第 349—350 页。

⑥ 陈淳著,张加才校点:《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一,第 364 页;卷三二,第 381 页;卷三一,第 368 页;卷三二,第 376 页。

⑦ 陈淳著,张加才校点:《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三,第 271—272 页。

⑧ 陈淳著,张加才校点:《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二三,第 269 页;卷二四,第 284 页。

⑨ 王宇:《师统与学统的调适:宋元两浙朱子学研究》,第 104—111 页。

宗就对杨简倍加尊崇,“答问往复,漏过八刻,上目送久之”①;袁燮之子袁甫也在嘉定七年取代朱门高弟李方子为状元。②

相比于嘉定年间其他朱陆门人各自表述、隔空论战式的道统之争,嘉定十年,远离学术中心、少有人际负担的陈淳以一种无所顾忌的方式直接表达了自己对陆门的愤怒。陈淳的言辞是如此激烈,以至于蔡仁厚先生误以为朱陆之争是由陈淳“决其澜”,但如陈荣捷先生所言,陈淳并非居于学术中心的人物,他的愤怒也没有引起陆门弟子的重视与回击。实际上,朱陆第一代弟子多有私交,在政治上也常有彼此支持之势③,所以朱陆门人全面决裂或始于嘉定、宝庆间黄榦、杨简、袁燮等朱陆高弟过世之后,但嘉定年间朱陆门下各尊其师的道统主张已经预示着矛盾难以调和,理宗朝及之后的朱陆之争只是将此种道统矛盾呈现地更为决绝。在这个意义上,陈淳在嘉定十年对陆学如此激烈的批评,倒可以视为一种“先声”。

“北溪之怒”未直接引发朱陆门人决裂的另一个原因是,嘉定十年宋金“兵端复启”④,并连绵多年。嘉定十年宋金开战后,由于对金政策的分歧,朱陆弟子就与当权者渐行渐远。曾讲学于四明史氏家塾、与权相史弥远多有往来的袁燮,在嘉定十二年(1219)因与史政见不同,终被罢官。⑤ 而黄榦在开禧、嘉定年间曾久任江淮前线诸职,但在嘉定十年宋金开战后,黄榦也终因与前线制帅议论不合而决然请辞。⑥ 远离政治中心、返乡讲学的朱陆门人,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与嘉定年间政治氛围相关的道统之争。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嘉定更化后,理学共同体内就深知理学复兴离不开朱熹地位的提升,因此陆门的“策略”更多的是避免直接批评朱熹,而选择径直推尊陆九渊⑦;理宗朝后陆门更是转而对朱学有兼涉之势,甚至提出朱陆是殊途同归。⑧ 晚宋至明,如道一书院、《道一编》者,多是陆门此种意图的表现。而朱门的“反应”则是始终警惕陆门的道统主张,更加坚斥陆学以保持自身的纯粹性,恪守朱陆之分。而在其后七百年的朱陆相争中,“北溪之怒”作为“先声”,其鲜明的批陆立场屡被后来者提及,不断激起新的“回声”,并为陈淳赢得了“卫师门甚力”“坚守师传、不失尺寸”的声誉。⑨

晚宋理学兴盛之时,不乏诚心坚信师说之人,其慕道之心令人钦佩;但也有基于道统的意气之争,加剧了不必要的分裂;许多时候,愈是一心向学之人愈有卫道之心,以至双方最终决裂如水火。亲见晚宋朱陆之争的刘克庄曾感慨:“佛者别南北宗,儒家分朱陆氏。鹅湖许多公案,烧了没一些事。”⑩元至治二年(1322),希望弥合纷争的袁桷作《龚氏四书朱陆会同序》时说:“(朱陆)生同时,仕同朝,其辨争者,

---

① 杨简著,董平校点:《慈湖先生遗书》卷二二,《杨简全集》第 10 册,第 2424 页。

② 叶绍翁撰,冯惠民、沈锡麟点校:《四朝闻见录》,第 73—74 页。

③ 比如在嘉定六年,袁燮就曾举荐过黄榦,详见《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第 749 页。

④ 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 2575 页。

⑤ 俞文豹撰,许沛藻、刘宇整理:《吹剑四录》,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主编:《全宋笔记》第 7 编第 5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9 页。

⑥ 《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第 760—761 页。小林晃认为,自嘉定十二年后,福建、朱门系的政治人物便从执政集团中消失了,详见小林晃:《南宋后期史弥远专权内情及其嬗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0 年第 3 期,第 65 页。

⑦ 最为学者留意的例子,或许就是袁燮在嘉定九年(1216)所作《濂溪先生祠堂记》中对周程道统的肯定,详见袁燮著,王瑞明校点:《絜斋集》卷九,第 141—142 页。崔大华认为这代表着袁燮接受了程朱派的道统观,详见崔大华:《南宋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1—172 页。

⑧ 何俊对晚宋理学的代际变化以及合流演变也有相应的分析,并整体性地从思想向文化的转型解释晚宋理学的演变。详见何俊:《南宋儒学建构》,第 309—413 页。

⑨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一,第 1386 页。

⑩ 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四五,第 2334 页。

朋友丽泽之益。朱陆书牍具在,不百余年,异党之说兴,深文巧辟。而为陆学者不胜其谤,屹然墨守,是犹以丸泥而障流,杯水以止燎,何益也?"①当年朱熹论道统时,曾言二程亡后"未及百年",后人就已叛其师说、难以接续道统;而朱陆亡后"未及百年",门人后学虽能护卫师说,但也失去了乾淳年间理学多元发展带来的活力,或许也未见得是真正接续了朱陆之学。

The Anger of Chen Chun: The Debate on Confucian Orthodoxy Between the Disciples of Zhu Xi and Lu Jiuyuan During the Jiading Perio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ang Yuansong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the tenth year of the Jiading (嘉定) Perio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Chen Chun(陈淳), a disciple of Zhu Xi (朱熹), who lived in Zhangzhou (漳州) for a long time, arrived in Lin'an (临安) and Yanling (严陵), and there he made a rare and fierce criticism on the School of Lu Jiuyuan (陆九渊), even describing Lu Jiuyuan's theory as "nothing right" and "the enemy of Confucianism". Chen Chun's rare and intense "anger" then became a landmark event in the debate between the School of Zhu Xi and the School of Lu Jiuyuan in the history of Neo-Confucianism, and was even considered as the "fuse" for the continuous disputes between the followers of Zhu Xi and Lu Jiuyuan. But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during the Jiading Period, we will find that Chen Chun's criticism of Lu Jiuyuan was not abruptly made, but was related to the then debate on Confucian orthodoxy between the disciples of Zhu Xi and Lu Jiuyuan. This debate on Confucian orthodoxy between the followers of the two schools during the Jiading Period was a continu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bate between Zhu Xi and Lu Jiuyuan, and wa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al situ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during the Jiading Period, which eventually generated Chen Chun's fierce criticism on the School of Lu Jiuyuan.

Key words: Chen Chun(陈淳); Huang Gan(黄榦); Confucian orthodoxy; the debate between the disciples of Zhu Xi(朱熹) and Lu Jiuyuan(陆九渊)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袁桷著,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卷二一,北京: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1089 页。